从『盈尺斋』到『卧绿馆』

萧 丁

给书斋起名是文人们写景状物抒情明志的一种表达方式。现在的文人很少有真正意义上的书斋，充其量也不过是书房而已，因为不是古式民居，就不可能在中堂前面挂块匾额，书斋的名字不过叫叫而已。我为附庸风雅，过去也用过“盈尺斋”之名，给朱亚夫先生记住了，就认真起来，写成文章编入《文人书斋》一书中。其实哪有什么书斋，是对当时生活状况的自嘲。我为解放日报工作，到八十年代初期，已有二十多年了，也没有人关心我的住房问题，要是现代的青年，早就跳槽不干了。那时无槽可跳，只好光挤奶，不吃草。七个人蜗居在十八平方米的两个亭子间里，除了家具，七个人站在一起也会把空隙的地板站满，哪里还有什么书橱、书桌！深夜下班回家，要小心翼翼踏着儿子们睡觉的地铺，才能到达自己的床。所谓“书斋”，就是不到一平方米的储藏室，正好放一台缝纫机，一只板凳。缝纫机的台面就是“书桌”了，拉一盏电灯进来，夜深人静之时，我就在这个“小天地”里独自笔耕。那时一方面经济还没有发展，住房建得少，另一方面，领导只懂让牛挤奶，不懂给牛喂草，所以我这“盈尺斋”之名，就带有酸味和苦味。

1979 年到 1984 年，我在威海路的“盈尺斋”里住了六年。1985 年年初，居住条件有了改善，搬到了市文化局的云阳路公房，有 38 平方米的实用面积，只因一家七口，人口密度太高，仍然不可能有单独的书房。我的房间是卧室、客厅、书房三种功能兼备的“多功能厅”。尽管如此，比原来好多了，我也很满足。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迷眼的乱花》大多在这里写的。到了 1992 年年初，我得到了陈沂同志的帮助，他请吴邦国同志批条，市机管局分给我丁香大楼三室一厅共 107 平方米建筑面积，居住条件进一步改善了。显然，“盈尺斋”早已名不副实。这时我已有独立的专用的书房了。从这时开始，我的第二本散文集《醉人的红叶》就在这书房里写成的。因为写了这本书之故，我便把书斋改名为“醉红轩”。这个名也是个虚名，我又没有牌匾，也没请人题字，谁知道你什么斋！

我这个人是落伍分子，但我的书房的变迁却是“与时俱进”。这几年又有变化了。我在佘山山边买了几间农舍，作为度假之用。那农舍在西佘山环山路旁边，开门见山，天文台、佘山教堂就在眼前。路边林荫蔽日，山上郁郁葱葱，早晨清气袭人，晚上万籁俱寂。我早把归田赋闲作为终极目标，现在虽不能在天台山幽溪深谷结庐独居，却能在上海唯一的美地佘山享受晚年，也是快乐。于是我虚拟的斋名又改为“卧绿馆”，并请曹简楼先生写了对联“醉红卧绿，亲水恋山”。还挂了高式熊先生为我书写的自撰对联“犁纸栽文无日夜，议时论世有锋芒”，这也是我的人生写照。书法有丰子恺、俞振飞、李一氓、王元化、高式熊、赵冷月诸老的作品，绘画有谢稚柳、程十发、张乐平、叶浅予、江寒汀、吴青霞、钱君匋、曹简楼、乔木、张炎夫等老先生的作品。丰子恺的条幅写了两首西湖竹枝词：“船动烟波艳艳秋，贪看年少信船流。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羞。”“十里塘边是妾家，小楼斜对木兰花。西邻阿妹声相似，莫误敲门去吃茶。”把情窦初开的少女对爱情的萌动写得十分有趣。那是丰子恺先生的学生胡治均先生送给我的，丰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敢公开作画，都是凌晨三点起床偷偷写字画画，到天亮时由胡治均前来取走藏起。李一氓老人写的是于谦的诗，也是写杭州的：“涌金门外柳如烟，西子湖头水拍天。玉腕罗裾双荡桨，鸳鸯飞过采莲船。”那是我的北京朋友文艺报副主编吴泰昌先生代我求到的。张乐平先生的三毛迎新年漫画是正月初一中午我们一起喝酒时的即兴之作。我与张老是忘年之交，又是诗画配的合作者，我们几乎每二周便有一次对饮。他的画室也是“多功能厅”，睡觉、吃饭、会客、作画兼用。我们对饮时把画桌清理出一角，放四只菜，各自一瓶绍兴酒，边喝边谈。说来你们不会相信，我们从 1960 年合作到他去世，经常对酌，够亲密了吧，可是他从没有送画给我。那次正月初一喝酒时我对他说：“你总该送一幅画给我吧。”说着他放下酒杯，拿了画纸，就在饭桌上画起三毛放爆竹迎春节，不一会儿画好了，我对他说，题两句话吧：“为伊消得心身碎，云霄一响报春来。”他照此题上，这是我们相交三十多年唯一的赠画。我觉得够了，画不在多，存念即可。每天抬头观画，如见这位慈祥的父辈就在身边。

雨中的风景（剪纸） 彭敏敏

从盈尺斋到卧绿馆是我个人居住条件改善的变化，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见证。

现在我的书房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奉调去太白先生的白玉楼工作，临行之前，我把书房内的一切都捐献给我的母校浙江省天台中学。

又到菊花盛开时

刘向东

听说老科长去世了，我惊诧许久。曾和他共事十多年从未见他生病吃药。他离休后我每次去看他，他都神气十足，怎么就突然走了呢？据说他走得仓促而平静，就像接到了执行任务的命令，雷厉风行地远去了。可我总觉得他没有远去。他还是老样子，一年四季总是一身干净严整的检察制服；讨论案件时，他总会默默地眺望着窗外，习惯地来回捋着根根挺立的一头光亮的白发；午休时，他总要叫我陪他下军棋；还有他一开口就有一股浓浓的大蒜味儿……特别是他临近离休的日子就越加忙碌，连午休时喜欢的军棋也放弃了，不是叫我一起整理卷宗文书，就是促膝探讨一些案例，还常常是楼上楼下跑来跑去为同志们“打杂”做后勤。有次，我见他抱着一大摞笔录纸劝他别累着了。他嘿嘿一笑说：“闲着难受，这点事累不着。”看着他的慈祥，欣慰之中又夹杂着将要分别的伤感。

老科长是山东人，经常带着煎饼卷大葱大蒜当午餐，故而有些同事叫他老山东。或许他浑身洋溢着山东人特有的厚道，同事们喜欢和他在一起，也爱与他开玩笑。但在我心目中，他既是严肃的领导，也是慈善的父辈。那时我才二十出头，一进机关他就叫我和他一个办公室。起初我十分忐忑，一来他是领导，我怕不自在；二来邻桌的内勤是个姑娘，我怕拘束。但后来的工作中，我不仅没有压抑拘谨之感，反而是舒心畅快，好像自己还是个孩子，总会有父辈的关爱。而这种关爱，除了工作上的严格要求和做人道理的灌输，还包含了对我们小青年终身大事的操心。科长经常安排我和她一起做外勤。我给他理发时，他也要叫我帮她做些修剪。尤其在我被派往皖南某农场工作的一年里，科长总要叫她把我每月的工资送给母亲。虽然我和她没能终成眷属，但他得知我们各自有了意中人后，就像了却了一桩心愿似的开心无比，还不时地嘱咐我们要工作爱情两不误。当然，科长对我的关爱远不止于这些，关心的还有我的工作和学习。那时我没有文凭，他就逼我参加自学考试，直到我通过大专、本科和研究生的全部课目。即使他离休后每月到单位参加支部活动，也要到我办公室过问我的工作学习。有一天，还把多年积累的案例整理好送给我说办案如医病。医生病例多临床经验就丰富，侦查员案例多就能找得失促水平。而幸亏有了这些宝贵资料，才让我完成了中国法学丛书的部分著作，并获得了学术奖。不久，在我调离单位的秋日，我带着新书和两盆菊花去看他时，他立马用毛巾擦了手再拿起书认真地看着连连说好，还鼓励我要多耕耘多收获。

老科长钟爱菊花。每逢菊花盛开时，他总要送我几盆亲手培植的菊花。他说菊花是君子，即使花朵枯萎也不凋落，而是“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做人做事都应当有这种坚韧如一的风格。每每回味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我总感到背后有股无形的力量和一双犀利的眼睛，在推着我看着我一路走着。

又是菊花盛开的日子，而院内一角的菊花比往年愈加茂密灿烂，仿佛在等着曾经的赏花人；树叶金黄的枝头上两只白头翁歌喉婉转悠长，那是在呼唤一个白发苍劲的老人！

错过

鲍 宁

早晨去公园散步，沿着环道疾走。快走完最后一圈时，发现河边小竹林旁，一绿衣女子蹲在那儿，拿着手机正在拍着什么。

我走了过去，凑近一看，原来是一只蜘蛛正在织网。它忙碌地穿行着，褐色的肢体在网上舞动，展示着生命旺盛的张力与美感。我亦拿出手机，弯腰刚想拍，忽而一想，走完这最后一圈再来拍吧，这时女子已拍完，蜘蛛织的网可能会更大、更密，我拍起来也更从容。

最后一圈走完了，我又来到小竹林旁，这时由于没有了绿衣女子这个标志物，我再也找不到这个正在织网的蜘蛛了。

秋阳淡淡地洒在竹林上，望着竹竿上泛出的这缕缕光亮，我拿着手机的空镜头，不免有些遗憾与沮丧，就是刚才那一瞬间的迟疑，我错过了对生命美丽过程的记录。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面粉遇到了肉

赵全国

在山村面粉和肉都是稀罕物，两位相遇的几率很低。在知青看来，面粉遇到肉就变成了饺子，这天就能把寻常的日子过成欢乐的节日。

几率虽低，毕竟不是零，有一天，它俩终于团聚了。于是和面、剁肉、包饺子，全体忙作一团。我手艺孬，也没人嫌弃，大家就是图个热闹开心。说句悄悄话：那时最怕有外人来串门——你懂的。

正忙着，忽见一个卷毛知青闯将进来。他是四里地外毛斜村的小葛，是我们的铁哥们，众人大喜。没等他坐下，小杜就递上一碗饺子，嘴里却嘟囔着：“每次有好吃的，你闻着香味就赶来了。当你的邻居真亏！”他大笑：“谁让饺子这么香？”

每当聚会提起那次的饺子，老知青都认为：若称它为“千里香”什么的是虚夸的广告，但称它为“四里香”却是事出有典的。

今宵打谜

陈汉臣

五位脚模

（四字口语）

昨日谜面：上海好邻居

（四字体育比赛誉称）

谜底：申城德比（注：比，比邻）

段子成真

王兆贵

在某超市正门左侧，有一家餐饮店，铺面不大，餐位不多，格调倒也清新利落。砖块饰纹的墙壁上，挂着老式桅灯，看上去像是海员酒吧，也有点像日本街边常见的 Bento 小店。

我到超市买完东西，天色已近黄昏，逛得累了，肚子也叽里咕噜地有点叫屈，就踅身走进这家小铺，打算简单吃点东西，垫垫肚子。看了看柜台上方几块粉板上的食谱，点了一碗牛肉煨面，买单后找个空位坐下来歇息，等待就餐。

面条端上来后，餐具却是一只上宽下窄印有卡通图案的锥形纸桶，热腾腾地漂着菜叶。为了凉得快些，我用筷子上下翻搅了一通，发现面条中除了青菜、香菇和一个鸽子蛋外，却没有一片牛肉。于是就问柜台旁的收银员：“你们的面条是用牛肉汤煮的吗？”她回答说：“不是啊，是牛肉。”我说：“怎么看不到牛肉呢？”她走过来看了看，不好意思地说：“可能是小厨忘了放牛肉了。”于是赶忙叫人端回去，加进牛肉后重煮。好在我年纪大了，面条煮得烂一点倒也无妨，好消化。

这当口，收银员（可能是店长）再次道歉，并介绍说，老板回老家去了，将餐馆交给几个年轻人打理。我想，年轻人做事一时粗心，也可能有什么心事，没顾上，并没责怪他们，却想起了数年前，在南方某报闲情版发表的一篇题为《巧问妙答》的稿子。其中提到一个笑话：顾客问老板，您这牛肉面里怎么没牛肉？老板回答说，这有什么好奇怪的，难道老婆饼里有老婆吗？

当初听到这样的段子虽然有趣，但觉得肯定是编造的，现实生活中怎么会有这等糗事呢？不想今天当真让我遇上了。今天这事虽说也属巧合，但还真有点应谶的味道。因而不仅没生气，反而觉得好玩。于是就顺便说起这个段子，店里的服务生和食客听了，无不莞尔。

作为民间语言小品，段子也源于生活，尽管经过了加工整理，但其中反映的人文世象仍能给人以启迪。像“老婆饼里没老婆”这样的现象，延伸到社会领域，就有许多类似问题。如，“清水衙门水不清”、“安全食品不安全”、“放心医院不放心”等，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边看边聊

秋冬“帽子”戏法

费拉拉

嫌弃秋冬着装造型过于平庸，又不想花大钱大规模置买时装，那么选择有趣的别致配饰就是一件相当划算的事。比如 10 月还没过完，我就在一个月里被各种帽子深深震撼了三个回合。事件一是外滩 Bund Classic 系列活动，当古董老爷车邂逅飞扬嚣张的大礼帽时，再寻常的小黑裙也显得复古优雅到不可思议。事件二是今年的“2015 秋季上海高级定制周”做了一场帽子秀展，这个小众的设计门类居然悄悄在本土培养了相当一批拥趸，女性来宾的帽子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事件三是王者杯国际马球赛，礼服和帽饰向来都是马球比赛的场外看点，今年也不例外。

七夕会 时尚感觉

帽子作为时髦单品，吸睛程度夸张得惊人，它不单可以影响到整个人的造型轮廓，更因为强有力的造型线条和庞大的体积感以及视线落脚点，第一眼就可以抓住他人视线。如果说女士正装是靠面料质感和手工细节质感堆堆砌出来的温柔美学，那么帽子就是造型大杀器，直接一枪毙命，简单有效地传递出个人气场。

在大多数人对帽子的接受程度还停留在海边度假遮阳的程度时，时装编辑已经把帽子细分到无论什么季节和场合都能找到对应款式和材质。例如牛仔裤出街，那么棒球帽或者鸭舌帽，再搭配一个铆钉双肩包就是潮人街拍造型了。如果喜欢大风天气针织衫温暖的抚触，那么贝雷帽和花盆帽可以作为基础配置。如果选择轮廓简洁的连衣裙，那么大檐帽可以轻易提升气质。而如果想显得英气勃发些，那么中性化的巴拿马礼帽款式就是很明智的选择。细究起来，其实每种帽子的命名起源和被追逐都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例如钟形帽是法国设计师卡罗琳·瑞邦在 1908 年发明的，原名“cloche”即法语单词“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曾经红极一时，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作家菲茨杰拉德笔下“爵士时代”的故事表情纹。而红色贝雷帽最初曾是英国皇家陆军第五空中机动旅的标志物，这支王牌特种部队曾在二战中获得卓越声誉，一度成为英国姑娘最愿意结识和交往的英雄，我一直猜测这种款式的流行源自女人天生对于“倾城之恋”（凄美又庞大的爱情故事背景）的狂想。至于棒球帽的长久生命力，则和 hip-hop 文化的繁荣密不可分，它在街头文化里的江湖地位就像涂鸦之类一样重要。

正如花有“花语”，帽子也有自己独特的“帽语”。按照西方传统习惯，帽子缀以花朵式样表示本人单身欢迎大胆追求，单边箭头的结则表示未婚但已经有男友，螺旋结通常表示已婚请勿骚扰。不过现在，这些隐晦的暗示已经不再被严格遵守。大量蕾丝、流苏、网纱、彩色矿石和羽毛被设计师运用于帽子之上，已经与婚否和年龄无关，只是简单传递着：瞧，我有多特别。